

生命回归与人格重建

李二曲 理学思想研究

俞秀玲◎著



人民
教育
出版社

生命回归与人格重建

李二曲理学思想研究

俞秀玲◎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立
版式设计:严淑芬
责任校对:陈艳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二曲理学思想研究 / 俞秀玲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01-016744-2

I. ①李… II. ①俞… III. ①李颢(1627—1705)—理学—研究 IV. ①B244.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6705号

李二曲理学思想研究

LIERQU LIXUE SIXIANG YANJIU

俞秀玲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55千字

ISBN 978-7-01-016744-2 定价:52.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 65250042

前言

每个时代都有一种反映该时代精神的主流思潮，作为李二曲生活的明末清初时期，同样也不例外。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潮主要表现为明清实学思潮。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中，其主流思想的演变是一个不断吸纳，融合各家各派思想观点的过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经过孔子的开创及其改造，以及孟子、荀子后来的总结汇融，儒学开始走向勃兴。到了汉代时期，大儒董仲舒重新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主张，由此而适应了当时政治在思想方面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从而使得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正统思想。随着儒学新形态的变化，儒家思想在与佛老之道的纷争与合流中有了新的发展变化：程朱理学应运而生。继之，明代的王阳明又以心学的形态将理学发展到了又一个新的思想阶段，从而成为中国儒学发展的重要历史发展时期。然而，明末清初之际，中国思想历史的发展发生了巨变。可以说，明清之际是中国的又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发展时期，此时，各种社会矛盾蜂拥而起，专制统治腐朽，明王朝的灭亡，对士大夫阶层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亡国之痛使士大夫阶层认真反思，他们开始对中国社会的痼疾及其明朝灭亡的原因从思想上、文化上进行深刻的反省并进一步著书立说。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的科举考试制度使得当时的思想界呈现出因循守旧、陈腐不化的学术风气；同时，西学东渐，西方的科技、文明开始传入中国，人们的视野大大开阔，思想界又一次出现了“诸子百家，百家齐鸣”的文化思潮与现象，由此而成为真正推动我国历史车轮的一部分。

明清时期是中国社会渐趋衰落的转型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又一次思想活跃的转型时期。此时，中国进入了思想裂变的剧烈大动荡时期，专制统治腐朽，各种社会矛盾蜂拥而起，激发了时代的巨变并推动了社会各种思想、学术等方面的变革，由此而涌现出了许多足以代表这一时代思潮的著名思想家，如李二曲、颜元、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一些著名的进步思想家，思想家们对正统儒学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与修正，儒学正统的权威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些思想家或对理学与心学融会贯通而加以吸收，如理学家李二曲；或对理学、心学思想进行批判性的吸收摄取，如实学家颜元、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正是由于他们的批判继承和有机融摄，才开创并建构了具有当时时代特色的明清实学思想体系，随着这一思想体系的建构，一批思想革新者、著名的思想家应运而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局面焕然一新，他们批判继承了传统的儒学体系，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

李二曲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明清易代之际的时代学人，当时之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李自成起义军在逐渐壮大中直捣王权，并最终使明王朝迅速走向了土崩瓦解，明政权在明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的结局中而走向了终结。然而，吴三桂一怒为红颜而起，并引诱清兵入关直捣王权，从此，山河易色。就这样，明政权在山河易色中而走向了消亡。正是明王朝的灭亡使得士大夫阶层痛定思痛，它对知识阶层来说无异于“来头一棒”的痛击。亡国之痛使当时的知识精英开始对当时社会的痼疾以及明朝灭亡的原因进行深刻地思想反省，他们著书立说、百家争鸣，进入对理学末流的深度批判和清算吸收，这就是李二曲当时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缩影。

当时的清朝统治者极力推崇程朱理学，猛烈攻击阳明心学，同时在广大学者中也极力贬低阳明学。在这种情况下，李二曲却反其道而为之，他认为阳明学和朱子学正是“明体适用之学”，同时指出，阳明学有“明体”的作用，而朱子学有“适用”的意义，所以“必也，以致良知明本体，以主敬穷理、存养省察为工夫。由一念之微致慎，从视听言动加修，庶内外兼尽，姚江、考亭之旨不偏废，下学上达，一以贯之矣”。李二曲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明体适用”。李二曲还提出，为学能否以“明体适用”为根本，直接关系到

儒学的明晦问题，其作用与意义在于“治乱世”而“醒民心”。正因为如此，李二曲为学主张兼采朱（熹）、陆（九渊）两派，认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实，极便初学”，而“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者中最为倣切”。李二曲折衷二者，主张兼取其长；同时，李二曲还重视实学，提倡“全体大用”之学，他不仅主张要读有用之书，同时也主张学以致用，注重实行。他曾经指出，走路一定要脚踏实地，千万不要踩空了步子。如果一个人治学只知道空谈理论而轻视实干实行，那就会如同走路踩空了步子一样的后果。李二曲这种重实行而不尚空谈的为学作风，正是其实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李二曲是明清之际的一位颇有成就的思想家，他一生读书、教书、著书，治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调一个“实”字。他注重实修实证，强调“悔过自新”。同时非常重视实学、实用之学。李二曲认为只有把这两方面的书都读通了，才能做到有德有才、德才兼备。

李二曲不仅反对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同时，还反对“真理只能由圣人垄断，凡人不能有所发现”的传统观点，他以许多出身微贱的古人 and 明代学人为例，强调指出，只要愿意用心钻研，不论圣贤抑或普通人，都可以在学问上有所成就。李二曲的这一思想具有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真理的价值指导意义，在今天看来，确实难能可贵，值得提倡。

本书正是鉴于这样的学术思潮背景，针对李二曲的理学思想进行研究。李二曲的理学思想有一个由程朱而陆王的转向，但他主张破门户之见，兼采程朱、陆王而归宗孔孟。笔者将李二曲的理学思想置于明清实学的思潮背景之下，既研究其思想产生发展的历程、历史思潮原因及其意义，又对其灵明光体从渊源、存养与适用等角度进行了深入论述，以期揭示李二曲“全体大用”的思想主旨，同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李二曲“儒学乃体用兼备的‘大人之学’”的观点，并由此对李二曲的社会教化思想从宗旨、内涵及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解读，从而揭示了李二曲社会教化思想的现代价值及其意义。本书最终将李二曲置于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中，通过对李二曲哲学与明末清初的实学家颜元、顾炎武、黄宗羲以及王夫之等大儒的学脉关系进行明晰的梳理，还李二曲一个适时的历史定位和价值评判。通过对李二曲思想的

详细论证，我们可以发现，李二曲是明清转型之际仅次于颜元、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伟大思想家，他不仅继承了张载关学“以躬行礼教为本”的“崇儒”宗旨和实学学风，同时还复盛了作为关中理学的儒学，从而将关学精神宏扬开来，等等。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如此“天崩地解”的大变局对一个真正的儒家学者在心灵上的影响，更有助于我们有效地利用二曲精神为我们今天人文价值方向的调整和精神伦理资源的建设服务。

《二曲集》作为李二曲的代表作，它是一部具有其独特的思想内容和学术价值的教育哲学名著。本书对于李二曲理学思想的研究正是基于该著作而展开研究的。

| 目 录 |

前 言.....	1
引 论.....	1
第一章 二曲学崛起的思潮背景.....	15
一、风雨飘摇与明清易代	16
二、理学式微与实学勃兴	17
第二章 虚明寂定的灵明光体论.....	20
一、理学与心学的兼融：灵明光体之渊源	21
二、虚明寂定：灵明光体之内涵	29
三、孔颜之乐：灵明光体之实质	42
第三章 独辟蹊径的知体论.....	48
一、超摄朱陆：知体论之形成	48
二、圆融微显：知体论之内蕴	51
三、形上还是形下：知体论之矛盾	58

第四章 保任维体的存养论.....	62
一、默坐澄心 明性见道	62
二、鞭辟著里 悔过自新	73
三、经纶参赞 明体大用	95
四、虚静光明 超然罔滞	102
第五章 体用兼赅的适用论.....	109
一、究心经济 康济时艰	110
二、酌古准今 通达治理	114
三、实心实证 达成仁政	131
第六章 明学术、正人心的社会教化论.....	144
一、“明学术，正人心”：社会教化之宗旨	145
二、体用全学：社会教化之内涵	149
三、启发与“无言”：社会教化之方式	160
第七章 李二曲哲学与明末清初的实学.....	165
一、李二曲与颜元	166
二、李二曲与顾炎武	177
三、李二曲与黄宗羲	185
四、李二曲与王夫之	193

第八章 李二曲哲学的价值评判.....	199
一、李二曲哲学的历史定位	199
二、李二曲哲学的现代价值意义	205
主要参考文献	213
附 录 文献综述.....	222
后 记.....	241

引 论

李二曲（1627—1705年），名颢，字中孚，今陕西周至人。取《汉书》“山曲曰盘，水曲曰屋”二语，自署为“二曲土室病夫”，学者称为二曲先生，另有“多惭夫”等自称之号，是清初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与吴中顾炎武、富平李因笃、华山王宏撰学术交往甚密，同容城孙奇逢、余姚黄宗羲一并“高名当时”，时论以为“三大名儒”^①。当时或以“海内真儒”、“博学鸿儒”、“理学渊源”标榜；或以“关中大儒”、“一代龙门”、“躬行君子”称颂。

哲学家的生平往往很平淡，尽管他们的思想可以“极高明”，并产生震撼人的力量，但其哲学的沉思却常常伴随着宁静单一的书斋生活。作为二曲也不例外，他固然有过中年以后（约6年）的各地巡回讲学之举，但其病中摄道的沉思与晚年荆扉反锁的哲学沉思却占据了他生活的大部。从早年哲学问题的朦胧萌发，到晚岁的杜门治学，二曲的哲学心路历程与其曲折清苦的人生感悟处处融合在一起。

^① 关于三大儒之说法，学界争论不一，亦有四大儒、五大儒之说。“清初时最有名望的三个大儒是：孙奇逢、黄宗羲、李颢。到了清末，人们讲清初三大儒，就改成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章太炎讲清初五大儒：孙奇逢、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梁启超则推崇四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此说法参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80页。关于这一说法，亦可参见何冠彪：《明清人物与著述》，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年版，第50、55、59及62页。

一、早年心路历程

二曲起自孤根，家无一椽寸土之产，既无家学，又无师承，但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寒饿清苦之中，却严守张载以来关学学者“以躬行礼教为本”的实学学风，艰苦力学，“自拔流俗，以昌明关学为己任”。二曲小时候因贫不能早学，九岁始入小学，然而就是在这样小的年龄，二曲提出了令塾师甚为发蒙的问题。据《历年纪略》卷首记载：“先生家世甚微，贫不能早学。九岁，始入小学。从师发蒙，读《三字经》，私问学长云：‘性既本善，如何又说相近？’学长无以答……”九岁的二曲就已经提出了有关人性的问题，这与王阳明十一岁时问塾师“何谓第一等事？”（见《阳明年谱》“宪宗成化十八年”条）及象山“自三、四岁时思天地何所穷际？”（见《象山年谱》“高宗绍兴二十一年”条）的问题同等重要。尽管他们提出来的问题，说辞各有不同，但是问题的核心却完全一致。从这里可以看出，二曲作为思想家和哲人的性格与品性，这一品性注定他可以与陆象山、王阳明前后相互辉映。然而年幼的二曲，其境遇之艰苦却令人难以想象，即使破落户的象山也胜其百倍。学仅二旬，二曲便因病而辍学，后来随舅父读《大学》、《中庸》，然而二曲旧疾时发，因而作辍不常。父亲李可从，字信吾，“为人慷慨有志略，喜谈兵，而以勇力著里中”^①，人称“李壮士”（同上）。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曲之父从军前往河南襄城镇镇压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不幸战败，二曲之父与同行五千人阵亡，这是二曲少时生活中的最大变故，此时二曲只有十六岁。按照当时邻里的安排及亲友的善意建议，二曲母子只有两条路可走：母亲改嫁，抑或二曲自己到县庭当衙役，但对于种种忠告和建议，二曲母子并未采纳，而是走上了与众不同的“路途”。就这样，母子二人走上了“突常无烟”而时常饥寒交迫、茕茕在疚的穷困之路。

接下来的几年对二曲的整个人生来说非常关键，它不但决定了二曲的人

^①（清）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卷二十五《家乘·周至李氏家传》，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25页。以下凡引该著作，只标明卷次、页码。

生志向，而且确定了二曲大致的为学路径和方向。二曲矢志于读书，然而因为穷困却无钱就学，而乡间塾师，包括其舅父亲戚等“知不能具束修”（卷四十五《历年纪略》，第557页），都将二曲拒之塾外，二曲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学问的追求。在前清时期，人们认为大凡有志之士，最出息的正途应该是求取功名，这在当时是一种时髦和潮流，更何况是穷困潦倒的寒门弟子二曲！对于二曲来说，求取功名是唯一让自己和母亲翻身的出路，而日日为生活所迫的二曲母亲——彭太夫人，其教子求取功名利禄以摆脱生活的窘境，在二曲当时的生活环境下亦可说是教子有方而绝不为过。然而二曲母子的想法，却与常人大异其趣，在二曲看来，天下第一等事乃读书学圣贤，而非攻取科第之名，这与王阳明幼时的想法完全一致，阳明出身于书香世家，然而后来还是走入科第一途。二曲则不然，他并没有被当时的社会世俗所羁绊，相反走上了“异途”之路（当然，二曲的这一为学指向自然包含其民族大义的成分在里面），这是二曲和王阳明两位圣贤的差异之处。二曲母亲不顾眼前的生活困顿与窘迫，她大力支持二曲一意完成其学为圣人——完人——理想人的志向和宏愿，这种伟大的母性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亦不多见，正如时人所比拟的：周至之有李母，犹邹邑之有孟母，可以先后媲美，实非过誉。在母亲彭氏“无师遂不可学耶？古人皆吾师也”（卷二十五《家乘·李母彭氏传》，第331页）的激励下，二曲利用拾薪采蔬之暇，取旧时所读《四书》，借助亲友赠送的字典《海篇》，逢人便问字正句，由此而“识字渐广，书理渐通，熟读精思，意义日融”（附录三《年谱·二曲先生年谱》，第627页）。从此，二曲向学之心遂定，并经常向人借经书以读。年十七时，二曲借读《冯少墟集》，“恍然悟圣学渊源，乃一心究心经史，求其要领”（《关学续编》卷一本传）。年十九时，“壁经既治，乃借《易》以读。……始借读《春秋公羊》、《左氏》、《性理大全》、《伊洛渊源录》，见周程张朱言行，掩卷叹曰：‘此吾儒正宗，学而不如此，非夫也！’至是步趋遂定，向往日笃”（同上）。与很多著名的理学家，如二程、朱子、阳明等初昧所向并不时地留连于释道不同，二曲在读书之初就矢志于道学，这一不平常的现象，常被后人所艳羡和称颂。世人把二曲的所取成就或归功于彭氏夫人的教养，或归功于二曲的天分。但是，由于现存的与李氏家世有关的资料中，关于彭氏夫人的早期生活、经历

以及知识背景、二曲在悟道前的致学经历等方面的资料甚为缺乏，所以母教与天分这二者在二曲选择人生路径时，究竟起了多大的影响作用还很难定论。然而有一点可以断定：二曲的父母都非读书人，亦非书香门第。在无师点拨的情况下，二曲能选择治学，又于学问中选择了道学，就不得不令人惊讶。自唐宋以来，在儒家学术发展的过程中，就已道分多途，虽然理学家力辟儒学新途，然而文章、训诂之学，尤其是能博取功名利禄的举子之业，从来就与道学并存，并且时时有凌驾于道学之势。在明清易代之际，这样的格局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因肩负学术误国的恶名，道学势力更显不振。因此，无论从社会大环境，还是个人生活的小环境着手，我们都很难完满地诠释二曲在早年就矢志于道学的各种缘由。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山穷水尽，没有任何可以利用和研究的线索。据《年谱》记载，“入夏，偶得周钟制义全部，见其发理透彻，言及忠孝节义则慷慨悲壮，遂流连玩摹，每一篇成，见者惊叹。既而闻钟失节不终，亟裂毁付火，以为文人之不足信，文名之不足重如此，自是以后绝口不道文艺。人有勉以应试者，校而不答”（附录三《年谱·二曲先生年谱》，第627页）。这一典型事件对二曲影响很大，从此，他对知行不一的社会现实有了最初的戒心，也从此对时文、文艺提起了足够的戒心（这种戒心直到他去世之时亦未能消除）。

在确定了为学路径与方向，同时又得到了母亲的大力支持以后，二曲的学业开始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了。据《历年纪略》记载，仅从顺治二年（1645年）至十年（1653年），即二曲十九至二十七岁期间，二曲博览群书，自经史子集以至百家释道、“西洋教典，外域异书”等无所不览、无所不知。后来，二曲自述其早年的学术经历，他说：“以余之不敏，初昧所向，于经史子集，旁及二氏《两藏》，以至九流百技、稗官小说，靡不泛涉”（卷十五《富平答问》，第126页），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二曲已经博览群籍，靡不泛涉。但二曲并不只是以此为主，他还以“撰述辨订”（卷十九《题跋·圣学指南小引》，第225页）为事。所谓“撰述辨订”，即指二曲三十岁以前在博览群籍的过程中同时进行的两项工作，即，在著述方面，二曲先后著有《帝学宏纲》、《经筵懾拟》、《时务急著》等，此时的二曲亲眼目睹战乱所造成的民间

疾苦，并深痛于“道学而无用，乃木石而衣冠耳”的流弊，他主张“学须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在辨订方面，除了在阅《道藏》、《释藏》以及西洋外典时随时随处“核其真实，驳其荒唐”、“以严吾道之防”外，他还著有《易说》、《象数蠡测》、《十三经纠缪》、《二十一史纠缪》等。二曲倾慕王阳明“通变不迁，文武兼资”的“有用道学”，因而青年时代的他主要究心于经济、兵法，凡“政体所关，靡不规划”。其中，二曲又特别注重经济（经世济用之学）与军事两个方面，并主张文武合一，倡导出将入相，期于当身当世展布事功以进行自我教育，在这一点上，二曲以阳明作为他效法的主要角色和对象。此时的二曲俨然王者师，同时又以经学家、史学家和理学家的姿态崭露头角。从二曲此时所接触的大量书籍来看，他此时的为学路向几乎受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并在治学方面具有显著的特点：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与国防军事结合的事功之学，二曲主张理学与经济并重，正因为如此，铸成了二曲当时（三十岁）所强调的“有用道学”。很显然，刚步入壮年的二曲，尽管著述丰富，但是于个人的生命心灵、人生的核心层的学问了无关涉，按照二曲的说法，就是“学未见道”。

值得思考的是，既然二曲阅读量出奇得广，为何连一本陆王心学方面的书也没有？

陆王思想在晚明风靡天下，清初虽然少衰，但绝不会沦落到毫无影响的地步。当然，《年谱》不可能把二曲所看过的书牍全部记录在册，但是从二曲自作的《悔过自新》小引中所记载的：“兹幸天诱厥衷，静中有悟，谨识其意于册，仍引证以前言往行，聊代韦弦，私用儆醒”（卷一《悔过自新说序·小引》，第2页）来看，陆王最喜静坐一着，但并不能由此就可以证明二曲受到了陆王的影响，程朱又何尝不言静坐！在程朱思想体系中，静坐之功比比皆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二曲在《悔过自新》说中所引的诸多例子中，除去与程朱有密切联系的一些理学家之外，还有王学之流，包括阳明与近溪等。可以看出，尽管在《年谱》中未涉及到与陆王派相关的代表人物及其事迹，但此时博览群书的二曲至少应该已经读过《传习录》、《近溪子集》，由此可见，尽管此时的二曲走的是程朱理学的路线，但是他对陆王心学并不完全陌生，这为我们理解二曲在三十一岁以后整个为学风格的转变提供了契

机。当然，作为二曲，之所以在此时主要以博览群书为主，这与他的学生身份，而非学者身份也有很大的关系，作为初学者，二曲无暇对其所读内容进行选择性或者融会贯通式的阅读，更何况二曲是在窘境中借书以读。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二曲此时的读书和学习是相当被动的，是一种不成熟的读书，这为后来二曲治学思想的转向提供了契机。不得不承认的是，只有在理性认识日渐成熟之时，二曲才会对自己以前所读的东西、积淀的知识进行反思，这种反思不仅是思想成熟的标志，同时也潜伏着思想背离的危险。

二、中岁病中悟道

自顺治十三年（1656年），即二曲三十岁以后，他在思想追求、读书为学等方面都开始有了新的转变，这一转变促使他重新认识自己以前的进学理路，这一进学理路得归因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即二曲三十一岁时的一次“突变”契机。

据《年谱》记载：

夏秋之交，患病静摄，深有感于“默坐澄心”之说，于是一味切己自反，以心观心。久之，觉灵机天趣，流盪满前，彻首彻尾，本自光明。太息曰：“学所以明性而已，性明则见道，道见则心化，心化则物理俱融，跃鱼非鸟，莫非天机；易简广大，本无欠缺，守约施博，无俟外索。若专靠闻见为活计，凭耳目作把柄，犹种树而不培根，枝枝叶叶外头寻，惑也久矣”。（附录三《年谱·二曲先生年谱》，第634页）

在《锡山语要》中：

后染危疾，卧床不谈《易》者半载，所可以倚者，唯此一念炯炯而已，其余种种理象繁说，俱属葛藤，无一可倚。自是闭口结舌，对人不复语及。盖以《易》固学者之所当务，而其当务之急，或更有切于此也。

(卷五《锡山语要》，第41页)

因这次“患病静摄”的机缘，二曲不能作博览的工夫，只好收敛身心从事静养（静坐或静卧），他“深有感于‘默坐澄心’说”，即“所可以倚者，唯此炯炯一念而已”；而“理象繁说，俱属葛藤，无一可倚”，则表明了二曲此时面临的一个治学难题：学本为安身立命，求人所以为人，而此刻读了，学也是学了，却于自家身心的建树了无大用。学得大堆书本的知识，个人却完全不能受用，心灵还是处于“飘荡”之中，这对于己身又有何用？此时的二曲认为“学所以明性而已，明性则见道，道见则心化”。于是二曲摒去一切，时时返观默识，涵养本源，并焚尽以前所著原稿，专阅洛、关、闽及河、会、姚、泾论学要语，并以此聊以印心。这就是二曲“见道”的心路历程。在二曲直接面对生死问题时，程朱理学思想却显得如此软弱式微，以至于根本就不能给人以任何支持，这对二曲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和刺激。

在此时的二曲心中，所谓的“撰述辨订”，只不过是一种“急本缓末”，一种“学之肤”而已，因为它只关乎痛痒，而无关乎个人心灵的慰藉，或者干脆说，二曲认为这种“学之肤”之计纯粹就是“学无头脑”。任何有足够自省能力的人几乎都会自悔少作，相反，很少有人会采取二曲这样决绝的态度。对此行为如果仅以雅意林泉来进行诠释，显然是缺乏足够说服力的。对于此，更深层的原因既在于二曲三十一岁以后整个为学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使得二曲对其早期的治学路径和方向极为不满，由此，二曲产生了强烈的悔过欲望，并作出了如此强烈而又与众不同的焚书行为。

此时，二曲放弃程朱理学而予以思想上的转向，几乎是必然的事情。二曲在其以后的讲学中，每每以了生死大事为言，究其起因，也不能不追溯及此。

然而，幸运的是，二曲在尽焚其前期所著之撰述著作时，并非将所有著作都付之以炬。《二曲集》中现存的《悔过自新说》、《周至答问》等著作都为我们研究二曲早期的思想提供了捷径。

经过这次病中“突变”的契机之后，二曲即致力于“切己自反”的明性之学的探讨，他或课徒乡里，或外出讲学，二曲不断完善其“悔过自新”学